



主编
肖燕雄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岳麓书社

大学生读书引论

1994



主 编 肖燕雄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肖燕雄编.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7—80761—221—6

I. 大... II. 肖... III. 推荐书目—中国—青年读物

IV. Z83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3418 号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主 编:肖燕雄

责任编辑:刘 果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25

字数:346 千字

ISBN 978—7—80761—221—6/G·704

定价:38.00 元

承印: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本书原本是新闻传播与传媒艺术专业读书活动的一个阅读教材。为此，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阐明过我的理念（详见附录）。

后来发现，它不光对上述两个专业的大学生有作用，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有价值，特别是对于初入大学之门的新生更是具有引导阅读的功用。如，从名家的学习和阅读经历中可以初入读书堂奥；在阅读所开列的论文和著作中可以逐步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和传世的经典；在阅读中真正学到读书的方法、获得阅读的快乐，以免一开始读书就茫然不知所之或让等而下之的读物败坏了胃口。故而，我将书名取为《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这也就彻底地昭示了我上述“功利之心”和好为人师的“野心”。当然，出版本书的最直接的用意是为了配合大学生的读书活动和特色专业建设，希望我们的专业所培养的是“有思想的传媒人才”。

于此，我还须对本书所选的论文和著作做一个简要说明。所选十二篇论文是我读后被深深折服才推荐给大家的。它不只是居有传递知识之功，而更有表达观念和思想的深意，而且是以深刻的论述、严谨的逻辑、富有理趣或明朗的文字传达出来的，读后让人提升境界，满口余香。这些文章遍布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其中一些篇什以举重若轻之力容括了一部皇皇大作的内涵。阅读它们，将花费少少许，收获多多许。如高尔泰、袁行霈、孙立平、张文木的论文就是这样。重点推介的十四部书《歌德谈话录》、《齐人物论》、《历史是什么？》、《光荣与梦想》、《万历十五年》、《太平杂说》、《论语》、《理想国》、《理想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历史深处的忧虑》、《通往奴役之路》、《国富论》、《如何阅读一本书》，也不是拣到篮子里就是菜。第一，这一次的“拣”不只是我个人所为，还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和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推荐；第二，有意识地从文、史、哲、政、法、经和读书方法方面去“拣菜”，古今、中外、史论都有顾及；第三，基本上是经典，有些是多学科交叉的经典，有些还是与中国现实紧密相关或能给予中国现实某种照应的经典，其中只有两本国人的著作《齐人物论》、《太平杂说》还不是经典，但它们是挑战经典文本或经典说法的近年来的“经典”之作，其训练大学生不可或缺的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将功莫大焉；四、尽可能挑“好读”者，即内容不要太艰深，文字不要云山雾罩、弯弯绕绕。

有关选文的排序原则是：名家读书体验部分先列名家大学学习经历，后列名家读书体会和领悟，其中又按作者的年龄大致排先后；论文选萃部分则以总论、文

学、历史、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教育、艺术进行排序。选文中文献、资料的明显错讹之处已根据可靠来源作了更正；选文中的注释体例力求一致，但个别篇什因为内容特殊，则尊重原作和原刊，不强作改动。著作的排序则综合考虑时间、国别、内容而定。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教学急需，也因为联络不畅，我们尚无法与本书中极少数作者取得联系，为了尊重著作权，特告知我的邮箱如下：xyxnews@sina.com，请论文作者与我联系，以方便奉寄样书。

最后，感谢我同事的雅言蕙心，感谢我指导的2006、2007、2008级部分研究生的无偿付出，感谢认真敬业的本书责任编辑刘果博士。祝大家好读书、读好书！

肖燕雄

于2009年3月4日

目录

导言	001
----------	-----

一、名家读书体验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003
北大六年琐忆	田炯锦/012
忆清华	梁实秋/020
燕京大学中文系	郑骞/027
读书杂谈	鲁迅/030
读书的经验	周作人/034
读书	胡适/036
我的读书经验	冯友兰/041
读书漫谈	钱穆/044
论读书	林语堂/047
说开卷有益	郁达夫/052
我的读书经历	杨宪益/053

二、论文选萃

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059
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	袁行霈/063
母语的陷落	郜元宝/073
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	何兆武/086
“救亡压倒启蒙”？	李杨/092
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	高尔泰/110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张文木/131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	强世功/161
“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	温铁军/179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孙立平等/186
大学之魂	肖雪慧/202
文艺与复兴	陈丹青/209

三、著作摘编与简介

《论语》摘编	219
《理想国》摘编	221
《歌德谈话录》摘编	223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 摘编	224
《通往奴役之路》摘编	225
《历史是什么?》简介	230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简介	231
《万历十五年》简介	232
《太平杂说》简介	233
《齐人物论》简介	235

四、大学生书评举隅

《如何阅读一本书》书评	241
美国自由的代价	243
畅快地阅读生动之书《光荣与梦想》	245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247

附录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读书活动方案	249
--------------------------------	-----

—

名家读书体验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

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当时我也说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我不知道陆平的方针是不是受我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创见，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没有涉及到我。

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夺了政权以后，把光绪皇帝在变法的时候所行的新法都作废了，只有京师大学堂继续存在下来。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我跟着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在他的签押房里看见过当时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用木板红字印的，有好几大本。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只记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经科”。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例如“尚书门”、“毛诗门”等。在本科之外，还设有通儒院，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吧。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当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们传说中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据我推测，他并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因为教务长主要是管教务行政，而总教习是管学术方面的事，约略等于现在大学里管业务的副校长。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的一位权威。他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他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隶（今河北）做官，在地方上办了有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曾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不见。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站在吴汝纶的门外（一说是跪在卧房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熙答应了。不料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死了，竟没有来得及到京师大学堂就任。吴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我们学生听了，都很感于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和吴汝纶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

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过些别人。我于一九一五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原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了，有些分配到文科各门中。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拖着辫子来讲课。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说，他在课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竟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又曾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我还听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赞成一夫多妻制，曾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用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那时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为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他的轶闻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俩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又比如说，他在堂上讲课，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又比方说，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请客）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这个学生所谓的客已经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

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走吧。

在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尊敬的教授，叫陈介石（黼宸），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侂胄翻案，说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了君父之仇，只有韩侂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好多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发出来，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好在他写的跟讲义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说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有点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说话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一九一六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死了，同学们都很悲伤。

马夷初（叙伦）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宋学”。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学长夏锡祺不知从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夷初。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没发讲义，我们对他就有点怀疑。去了好几天，才发出三页讲义。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我们一看，都说这不像一个现代人所说的话。那时候我当班长，同学们叫我去找学长，说这位先生不行，请换人。学长说，你们说他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我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学长说，讲义怎样讲错了，也得有个理由。我回到班里一说，同学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这位先生的讲义只有油印的三页，我们一下子就写了十几条理由，可以说把它批得体无完肤。我送给学长。学长一看，也无话可说，只问：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我说是我们自己写的。学长说，等我再看看，不过有一条：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学校解决。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我找去说，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你们可以当堂同他辩论。我说，学长讲过，不许我们对他直接有所表示。学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学校讽令他辞职，他不肯，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有见过。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也狼狈而去。

一九一六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所不能比拟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合适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也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兄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屋里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那时候，章士钊（行严）在北大，给一年级讲逻辑，我去旁听过两次。他原来讲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中国哲学史——墨经。我有几个问题，写信给章士钊，请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在某一天晚上到校长办公室等他。我按时到了校长室，他还没有到。我坐在幔子外边等他。又陆陆续续来了些人，像是要开什么会的样子。最后，章士钊到了，他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穿的也很讲究，风姿潇洒。他看见我，同我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解答问题。我看要开会，就退出来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蔡元培，因为他也不经常露面。一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旧学生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我们每人都拿出来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有一个久在北京教育界做事的留学生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的恭敬，说明大家真是佩服蔡先生。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

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生不讲理，最难对付，我说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个道，并不是那某一个人。在现在的大学里，道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科学，就是技术，这都是应该尊重的。谁讲的好，谁就应该受尊重。再重复一句，所尊的是道，并不是人。在大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误说为“师道尊严”，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张百熙、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合集起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同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学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

附带再说两点。陈独秀的旧诗作得不错，邓以蛰（叔存）跟他是世交，曾经对我说，陈独秀作过几首游仙诗，其中有一联是：

九天珠玉盈怀袖，
万里仙音响佩环。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碰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说，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写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愤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

大学生读书引导读本

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种弊病是不可救药的。陈独秀评论书法，不注重书法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气韵，这不仅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对于一切文艺理论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动乱中所批判的“智育第一”、“学术至上”吧！“学术至上”一经受到批判，就一变而为“学术至下”了。当时有人在农村提倡“穷过渡”，在学校中所提倡的，也可以说是愚过渡。好像非穷非愚，就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极“左”思潮的危害性，是多么大了。随着“学术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知道，“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当时所针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上面已经说过，在清末民初时代，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虽然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就中国的历史说，那些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的。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做学问，可是成功以后，他们的成绩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都大有好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作为业余的学术爱好者，为学术而学术，尚且可以得到成绩，有所贡献。如果有人能够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本业，那他的成绩必定更好，贡献必定更大。我认为，从学术界方面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保证有一些人，能够在不求名、不求利而能生活的条件下，“为学术而学术”。大学就是这样的一种机构，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发挥出来。

在十年动乱时期，还批判了所谓“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办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管理学校的一般行政事务；一个是教务长，管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蔡元培规定，教务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还不很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究竟是怎么个治法。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的精神。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在民国已经成立了几年之后，还是带着辫子，穿清朝衣冠，公开主张帝制，但是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

请他教英文。这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那时候，在东京这样的人不少，章太炎也是其中之一，比较年轻的人都以章太炎为师，而刘师培却是独立讲学的。这样的人也都受孙中山的影响，大多数赞成同盟会。刘师培也是如此。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他没有上几课，就得病死了。

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的反动人物保留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毛主席也是顺着这条道路进入北大的。在他们的领导下，革命的道路越来越宽阔，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壮大，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的高潮。

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学门的功课表都订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功课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来，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学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说是选修课也不很恰当，因为这些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有一位讲《公羊春秋》的老先生崔适，他写了一部书，叫《春秋复始》，已经刻成木版，印成书了。蔡元培把他请来，给我们这一班开课。他不能有系统地讲今文经学，也不能有系统地讲《公羊春秋》，只能照着他的书讲他的研究成果。好，你就讲你的《春秋复始》吧。他上课，就抱着他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以我们当时的水平，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他就是那么诚诚恳恳地念，我们也恭恭敬敬地听。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你可以说韩侂